

白欽先
經濟金融論文集

李沛瑤



白欽先
經濟金融論文集

李沛瑤



中國金融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钦先经济金融论文集/白钦先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 3

ISBN 7-5049-1380-4

I. 白…

Ⅱ. 白…

Ⅲ. 经济学-文集

N. F-53

白钦先经济金融论文集

白钦先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发版发行

(北京广安门外小红庙南街3号)

沈阳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20 插页:12

字数:434千字 印数:1—1000

责任编辑:邓瑞锁 版式设计:朱 敏

封面设计:赵 刚 责任校对:肖 杰

邮编:100055

ISBN 7-5049-1380-4/F·1061

定价:精装 42.80 元

序

陈岱孙

白钦先教授的《白钦先经济金融论文集》一书即将出版,来求序。

白教授长期从事辽宁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已出版经济专著和高校通用教材九部(《比较银行学》、《中央银行学》、《金融通论》、《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等),公开发表经济金融科研论文近百篇。

本文集收文共43篇,为上述近百篇论文和历年在各场合所作之专题报告资料中筛选、整理、编纂而成的。

本文集分为三部分——经济论、12篇,金融论、27篇,方法论、4篇——而以金融论为核心。在这些论文中,白教授对金融——经济部门,既对其理论有精深的论述,复着重联系我国实际,尤其是我国近年来和国际金融有关的若干热点问题,如金融改革、银行体制、国际经济战略、综合平衡,以至于国际金融的惯例、规则、风险等的实际,并对之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本书的出版不但为学术界所欢迎,而且足供实践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时的参考。

九四年十月

序 言

陈家盛

欣逢钦先教授论文集出版之际，作为从事国际经济金融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仁、前辈，看到我国经济金融事业不乏一批有实力并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在辛勤耕耘、探索、追求，由衷地感到欣慰。

钦先教授同我既是师生，又是同事，我们一起共事近 20 年。其间，为建设与发展国际金融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教育共同奋斗，在异国他乡为维护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誉彼此勉励与支持，在相处过程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钦先给我的印象是：学识渊博、功底扎实、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洞察力敏锐。十多年来，他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不倦地进行教学与科研工作，在许多领域进行了探索性和开拓性研究，形成了自己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的鲜明特色与风格，确立了在国际金融比较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为繁荣与推进我国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辛勤的劳动结出了累累硕果。这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论文集，就是钦先教授十几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与缩影，具有开拓性、超前性、专业性和较高的层次性等特点，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在浩如烟海的经济金融学科体系中，钦先教授在诸多的领域

里都留下了自己探索的足迹。他从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十多年来,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进行广泛的探索,在诸多领域进行了持续性的、系统性的和专业性的研究与思考。在诸如比较银行学、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宏观国际结算学、外汇的特殊宏观效应、国际经济金融活动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正负效应,以及改革的方法论、经济金融研究工作的方法论选择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在本论文集中不乏此类文章,为我国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带来一种新的气象。

改革的时代,呼唤改革的人才。我国十多年来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改革也为有志于投身这一事业的广大经济金融学者开辟了广阔的翱翔空间和视野。冲破旧的樊篱,站在改革的前沿,发挥理论研究为改革服务的先导作用,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钦先教授准确把握这一时代脉搏,怀着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与参与着中国的伟大改革。他在繁重的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之余,积极从事科研工作,并以各种不同形式参与改革实践。

通观钦先教授的全部教学与科研工作,通读他的全部著作与学术文章,包括这部论文集,使人强烈地感到他科研工作具有如下鲜明特色与风格:

强烈的时代感和广阔的视野

听钦先教授的讲课或学术报告,阅读他的专著或文章,我常常被他那强烈的时代感和广阔的视野而深深感染。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听广播看报纸,对国际政治外交问题有特殊的兴趣与敏感,这种浓厚的兴趣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与日俱增。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而

未能如愿以偿投身于外交工作，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与才能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但这对他所长期从事的国际经济金融教学与科研工作却产生了深刻广泛的持久影响。他的这种兴趣与职业特点，使他始终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时刻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种种重大问题，特别是对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外交这类全球性战略问题更为敏感，颇具见地。这些问题从深一个层面上看，本质上是彼此相互紧密关联的，或者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他的这种全球性战略观点与广阔视野，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例如，作者关于“市场经济是高度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了的商品经济，是高度信用化、信息化和金融化了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二战以来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事态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全球一体化”的观点；关于“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复关问题，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的观点；关于“金融经济，金融具有深刻扩散渗透性功能”的观点；关于“对外经济贸易需以适度规模、适当速度发展，并注意研究它所需的条件、代价与经验，正效应和负效应”的观点；关于“外汇的特殊宏观效应，内外两大系统间的交叉对应效应，外汇资金调度管理的原则与方法，外汇业务体制和国际期货构成外汇的国家风险”的一系列论述与观点，等等，这些观点在他的专著与文章中都得到自始至终的坚持与贯彻。理论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它是开放的，但理论若能说服人，就必须彻底，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在不少问题上，他的看法较一般人更早些，更敏感些，更冷静些，更尖锐透彻些，预见性也更强些。

改革与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主旋律。我们看到，收入文集的所有文章都紧密围绕这一主题，对一系列国内或国际

经济金融有关热点问题进观察、思考、分析与研究。作者同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十多年来，作者以多种形式亲自参与了我国的许多改革实践，通过超前性的研究与思考，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专业部门提供了大量颇有见识，颇具实践性的咨询建议和报告，主持了国家“七五”、“八五”社会科学规划有关项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有关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这一研究系列上，并受到教委主持的由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权威性评审委员会的肯定与很高评价。鉴定结论意见认为，“《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是我国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突出的学术成果，该成果对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多角度、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和开创性进展，填补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研究的空白，并达到国内外相当高的水平。该项目的立项是超前的，完成是及时的，并具有相当的难度。该项目成果为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体制的设计和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于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指导价值，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富于创造性与开拓性的探索

凭借其扎实深厚的经济金融基本理论素养和对现实经济金融紧迫问题的准确把握与理解，钦先教授对一系列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富于创造性和探索性的研究，充分显示了作者广博的知识与才华。例如，80年代初在“国际贸易”杂志上发表的科研论文“论国际结算方式”一文，是一篇理论性和针对性很强的、颇多创建的专业文章，作者提出了“国际结算方式是一种结构、系统，是

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系列”的观点，曾引起国际贸易与金融界的广泛关注。又如，他首次提出了“外汇的特殊宏观效应”和国内国外（物资与资金）两大系统间的“交叉对应效应”的观点，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者最早系统地论述外汇对一国国际收支、物价与就业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因素的特殊作用与影响，及国内外物资与货币两大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文章，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此基础上，在80年代中后期又进一步提出了外汇资金调度管理的理论依据、科学结构、原则与方法。在对各国银行外汇业务体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银行的外汇业务交叉问题，根据外汇业务的特殊性，提出了外汇业务主体高度集中、适度分散和广泛代理的正确主张。接着又从更为实践性的角度研究了汇率风险问题，提出了国际贸易中汇价和货价的“双亏双盈效应”与引进外资中的汇率与利率的“双亏双盈效应”，此即所谓“三双效应”。这一通俗易懂的生动概括很易于为国际贸易金融实际工作者所掌握与运用。

经济金融学者研究金融问题，最恰当的方法是首先将其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市场问题来研究。基于此理，钦先教授在研究金融问题的同时，也十分关心并倾注大量精力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及市场问题。“论外延扩张型经济模式的特征与后果”、“三种花钱行为模式的经济学涵义”和“菜篮子里的经济学”等文章，都是作者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层次基本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关于金融理论的改革与金融改革的理论的一系列主张与论述，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雄辩地证明了作者观点的深刻性、创造性和理论上的勇气。

除此之外，人们不会忘记，由于钦先教授对“比较银行学”研

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晨奖”一等奖。文集作者关于比较银行学研究对象——银行体制九大要素，特别是对其中发展战略、构造方式、业务分工制度、运行机制、运转环境和总体效应的阐述，都具有相当的创造性，在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例如，金融发展战略中常规型、滞后型和超前型发展战略模式，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间的自然倾斜和人为倾斜模式的提出；经济金融运行机制中经济性竞争淘汰机制、行政性监督管理机制和法律的诱导、规范、强制和保护机制三者同时交叉作用的观点；经济金融构造方式、运行环境中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多角度多层次要素的挖掘和阐述；经济金融体制各有关要素间的总体效应吻合度的观点；划分不同银行业务制度的若干标准的提出；银行集中垄断模式与方式；银行与工商企业关系的模式、联系形式和优劣利弊的分析与阐述；银行业务交叉，外汇业务交叉，金融自由化问题的多重思考；关于国际期货，特别是金融期货、外汇期货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层次最高、最复杂，信用性、风险性、信息性、金融性和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市场经济形式的论述，关于将国际期货、特别是金融期货和外汇期货列入外汇的国家风险加以特别限制与管理的观点……都无一不充分显示作者观点的鲜明深刻性和开拓性。

超前性研究与对事物发展进程、规律性的准确把握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事教育工作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忍得住寂寞，耐得住贫穷，其次必须能坐得住冷板凳，而又能顶得住各种功利主义的诱惑与刺激。这就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需要对

事业有强烈的热爱与执着的追求，有高度的责任感与事业心。特别是一些很少为人注意，很少功利刺激而又费时、费力、费神，需长期坚持不懈地从事研究思考的那些领域与课题，就尤为如此。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年二年、十年八年以后必然面临或必须解决的那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超前性研究。而要能准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经济金融问题，及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的未来发展进程的规律性，就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长期的、持续性的、系统性的和专业性的观察与思考，并具有远见卓识与较强的理性思维，才能准确掌握看不见、摸不着，但以其的必然性发挥作用的那种客观事物的必然发展进程，即规律性。读了钦先教授的文集和有关专著，深感他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傻子”学人。

超前性研究最终被事实证明确实是超前性的，它指的是符合预见性、科学性、指导性和实践性的要求。文集中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仅举几例：其一，作者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这篇长文中，全面阐述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金融理论的改革、金融改革的理论、一系列重大战略选择、原则与对策。这篇文章最早写于1984年，以后又多次修改补充，至今已逾十年。这十多年是中国改革面临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变革的转折时期，它的某些方面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对这一复杂改革的进程和将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选择与对策的意见，能有那么高的准确度和那么强的预见性，这使他的学生们和众多读者深感惊讶，这实在是难能而可贵的。其二是作者围绕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问题所进行的持续十多年的调查、研究与思考，以及对这一问题发展进程的总体把握。据我所知，文集作者在我国理论与

实务界最早在其专著和文章中正式提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将会面临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分离分立这一战略选择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思考。1993年初又在作为第十届泛太平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大会的报告论文“以市场经济原则重新构筑中国的银行体制”一文中，又专题论述了这一分离分立问题。同时作为国家教委“八五”重点社科规划项目，又进行了专门全面研究，终于在国家作出这一重大举措前几个月，完成该项目并出版专著，有力地配合了这一重大举措的实施。围绕政策性金融机构问题所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系列文章，体现了作者对这一客观进程不同阶段的准确把握和相应采取的行动与措施。

深深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

钦先教授有很深的文化历史修养，尽管他的思想与视野是开放的，但他的心灵与文化仍然是中国式的。他的深深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这首先表现在他处理民族文化与现代化，本国与外国文化的正确原则与态度上。作为从事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专业学者，他大量面对和接触到的是世界各国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与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趋势、成果、经验与问题，这就产生如何正确对待别国与本国、别人与自己的严肃问题。但又不是通过简单的激烈言辞或公开宣言一类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严肃认真的专业性问题稳定而鲜明地得到贯彻。从这一原则与态度中，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自豪与自信。作者在80年代后期公开出版的专著《比较银行学》的绪论中指出：“中国要现代化，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

化与外国化。现代化必须民族化、中国化。”他认为“任何国家或民族都应有勇气承认别国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这是充满自信的表现；任何国家或民族都应有能力吸收、接受和消化别国的优秀文化与先进经验，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不被同化、异化或弱化，这是强而有力的表现。”建国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证明了作者的这一态度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推敲的，是富于勇气与胆略的。虽然《比较银行学》、《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以及许多专业研究文章，都是以外国经济金融为其研究对象，但作者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不在外国而在本国。《比较银行学》的最后一篇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的最后一篇是“中国的选择与对策”，是在前三篇多角度、多层次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构筑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基本模式、构造方式、途径和方法论选择。这些都是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洋为中用”原则的鲜明表现，但作者既不是简单的比较或类比，也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经验或做法，而是在对中外不同国家、不同经济金融和社会环境比较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环境与特点的种种选择与对策。一如作者所说“对外国的文化和经验，凡健康有用者一律拿来，为我所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排斥，闭关锁国肯定要不得；然而不分良莠、真伪和适用条件，全盘盲目照抄照搬，也不可取。学习研究外国，切忌只有因袭而无创造，只见别人而无自己”。应是创造性的研究，创造性的学习，创造性的实践。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成功的尝试和实践，这是很可贵的。

作者深深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还通过他的讲

课、讲演、报告、文章以及有关的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他对自己的祖国与民族怀着刻骨铭心的热爱，他时时感到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尊严与自豪；他时刻关注并直接以各种不同形式参与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他常常为自己祖国的繁荣强盛，综合国力的提高、改革的成就和民族的觉醒而兴奋不已，也不时为国家面临的某些困难、问题、矛盾与潜伏着的某些危机而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与忧虑，有时也对我们改革开放中难以避免的某些问题和“阴暗面”进行批评和鞭鞑。这种深深的“热爱与自豪”，从理论研究与实践两方面的积极参与，这种“兴奋不已”、“不安与忧虑”、“批评和鞭鞑”，貌似相互矛盾，实则高度统一，统一于他深深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责任感，统一于他深层次的观察、研究与思考，放眼全球，放眼于全民族的前途、命运与未来的严肃认真的“忧患意识”。这种严肃的“忧患意识”，使他永不停息地奋斗、观察、研究与身体力行，许多情况下他比我们更深沉，更累，更具压力与动力。从他在同外国有关政治家、企业家、银行家、官员、教授、学者的交际、交谈与讨论中，显示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应有的尊严、学识、智慧与远见，他平等待人，不卑不亢，不轻易放弃原则，不轻易苟同，充满自尊与自信，这一切反而更加获得了对方普遍的尊敬、肯定与赞扬。

他关于中国复关问题的许多场演讲与报告，几乎场场暴满，他的许多分析与忧患，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并不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点也集中反映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关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文章中，集中反映在关于中国复关走向世界的必然性，别无选择与历史性的抉择的分析中，反映在从全球角度对中国复关问题的观察思考中，反映在对八年复关谈判

艰难历程的观察思考中，常常使学生、社会各界的男女老少深深感动，乃至热泪盈眶。这秘密就在于发自内心的真诚与真实，强烈的爱憎和对事物客观发展进程的准确揭示。

深层次、多角度、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钦先教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科研工作紧密联系教学和社会改革实践，并为之服务，这突出地表现在前述超前性和开拓性研究方面；二是哲学与战略高度的方法论思考，此点本文将另设专题论述；三是深层次、多角度和综合性比较研究方法的自如运用。

比较研究是当代各学科普遍运用、成果显著并受到极大欢迎的一种独特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运用更为普遍。钦先教授将比较研究方法大量地、系统地运用于经济金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与风格：（1）他大量地、普遍地、系统地和熟练地使用这一研究方法，例如专著《比较银行学》、《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以及《中央银行学》，都是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的成功范例，收入文集的文章，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的也很不少。（2）深层次、多角度、综合性比较研究。在国内外比较研究方法被大量运用，但很成功的不是很多，大都流于浅层次、单一角度、平摆并列和客观介绍。钦先教授将比较研究方法推向更新的高度：或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比较；或静态比较，动态比较，且动静态交错比较；或浅层次比较，深层次比较，更多角度、多层面比较；既比较异，也比较同，更突出比较异；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或小同而大异，或小异而大同；既比较特征，更突出比较形成这些特征的民族社会

历史、经济金融环境，进而比较其优劣利弊，尤比较在何种条件下为优，何种条件下为劣，这其中就暗示着方法论的思考与启迪；或国别比较，专业比较，更总体综合比较……这种纵横交错，动静结合、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比较，更易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同周围各种环境与条件的联系，更易于发现新事物、新知识，更利于开拓与创造。(3) 由于这一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与角度，开阔视野，发人深省，给人启迪。这种研究方法，在高校和社会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看到，比较研究方法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广泛运用，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新成果。

哲学与战略高度的方法论思考

尽管文集中方法论一类的文章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它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部分文章自成方法论一篇。方法论问题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则是一个根本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决策体制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人们到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或各类书店转一转，再到各类图书馆和资料室翻一翻，几乎找不到一本系统研究方法论问题的专著，文章倒有一点，但并不多。时至今日，我们的各类报刊杂志，各种文件、决议、会议，很少专门涉及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竟被如此长时间地普遍忽视、轻视、漠视，实在是很令人惊奇的。记得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抽象思维。如今，衡量一个民族进步和现代化的程度，常常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群体的抽象思维，即理性思维的能力上。

在4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在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常常重复走许多相似的弯路，重复犯许多相同或相近的错误，面临许

多相同或相近的困难，重复交同样多的学费而难以自拔。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基本的原因之一便是犯了方法论方面的错误。诚如文集作者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方法论问题是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是比具体方案、计划、项目、实施规划更带根本性和更具重要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如此长久地被人忽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文集作者在这方面倾注了较多的精力，奉献给我们一批研究成果，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这些成果本身，更在于向社会各界呼吁要重视方法论的选择和加强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早在1985年作者就撰文提出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思考”；接着1988年又在一家很有影响的全国性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要重视改革的方法论研究”；继而在1988—1989年期间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深化改革的方法论选择”这一重大课题。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如下八种不同的方法论选择：（1）目标明确、总体规划系统工程与零打碎敲走一步看一步的两种不同方法论选择；（2）简单机械地强调实践，干起来再说与回顾历史自觉吸取各国经验教训并以此指导实践的两种不同方法论选择；（3）法律制定实施适度超前诱导和规范化与法律长期滞后各行其是和无所遵循的两种不同方法论选择；（4）多重方案、多重选择与单一方案别无选择的两种不同方法论选择；（5）简单地“一刀切”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两种不同方法论选择；（6）培育“花盆”与“花园”的两种不同方法论选择；（7）可行性论证与论证可行性、可批性的两种不同方法论选择；（8）自上而下迎风而进与自下而上避重就轻的两种不同方法论选择。

此外，文集作者结合本身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实践，并针对现